

论新时期中国学界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

□ 陈学明 马拥军 罗 骞 姜国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一、“启蒙主义”式理解

(一)“新启蒙”的意识形态想象

启蒙主义的理解路向,在历史和逻辑上都是必然的一个环节。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思想合唱之中,主要的理论工作方式还不是自主建构,而是对西方思想文化著作进行大规模译介,攀缘其上进行自己的阐发。反思和批判人的“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境遇及其原因,这是“新启蒙”大潮中的时代议题。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其中,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启蒙主义的解读,把启蒙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这种解读在更深层面上是“借用”,即借用马克思充当了合法性资源和理论武器。用启蒙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和“借用”马克思,表面上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去政治化,但是,这种去政治化又包含着自身的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类解放”退回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解放”。这一“新启蒙”语境下的“现代”,是等同于“现代西方”,包括对“现代西方”所呈现之结果和所由达成之道路,都只是一种笼统的把握。这种笼统把握的“西方”图景,缺乏分析,也缺乏批判,更加入了很大的想象建构成分,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无意或有意地回避了对笼统的“现代”和“西方”进行明确性,即加以资本主义的定性。同样,它也意识形态化地笼统对待“传统”,其中也包括了既往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把传统社会主义看作是由封建的、东方专制社会的因素与产生于西方先进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与杂糅。

(二)实践哲学的去唯物主义化、非共产主义化阐发

与思想和政治启蒙合唱中的从旁“参与”和被“借用”相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见解,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繁荣。在这种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又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一些倾向,向着近代启蒙以来抽象的“主体性”、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的偏移,乃至有论者主张要去掉“唯物主义”的“后缀”(实际上是其内在的本质规定),自觉地要成为非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放弃了唯物主义基础的实践阐释,并不是对旧唯物主义的真正扬弃,而是存在着滑向唯心主义的危险。马克思当时对实践的强调,有着论证共产主义运动、直接服务于1848年对社会的革命实践的问题意识。这并不是仅仅为了论证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本身,不是仅仅为了凸显人在这一方面的主体性和力量,更是包含着一种论证目的,是要论证人对一切人造存在物,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形态,都居于创造主体的地位,从而论证出人有能力对社会状况本身加以改造,即“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从生产转进到革命。非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恰好是忽视了马克思早年思想的这些基本倾向,它表现为对近代启蒙主义式的、抽象的“人”或“人类”的力量和主体地位的推崇。当然,人本主义的阐释也是切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本身的社会现实的,当时还缺乏认识到这一点的社会基础。

(三)对现代性之资本维度的崇拜

更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界的关注点是马克思对经济基础的关切,注重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从这一研究的本意来看,是要处理中国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回答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要回答中国是否能够、何以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形态,是要回答中国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景目标是什么。在确立了我国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梯并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完成现代化、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的大前提下,也会存在一些倾向。这就是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等因素来淡化乃至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规定性,把我国所进行的现代化道路,混同于西方所走

过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甚至直接忽略道路过程,以西方业已实存的现代性为模板来裁剪中国现实,要求进行社会制度的直接仿照和移植,包括西欧社会从中世纪晚期以来渐次萌生并发展成熟的诸种因素和特质。但更深入地看,这种诉求仍然没有摆脱启蒙主义的笼统性。

(四)对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式批判

马克思从早年开始就对资本主义开展了不懈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其一生中的两大发现形成了共产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派别,其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正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早期历史观的真正要义,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抽象设定,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基于人本主义设定的历史观,与成熟时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着深刻的对立。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抽象出“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设定,使得由此出发对资本主义做出的批判,陷入了和启蒙学者及空想社会主义同样的困境。

二、“后现代主义”式理解

(一)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消解了理性主义的合理遗产

后现代主义本身,它是作为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人本主义分支中的派别,在整个现代哲学批判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大旗之下,这一派别尤其表现了对人类理性和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全盘否定,表现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表现为拒斥历史的规律性、进步性等,所以它本身在理论观点上是同启蒙以来形成的现代性思想建制尖锐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以及用这两种路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诠释,都是形成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反映了国人对自身生存境遇思考的时代特点,是力求服务于对“人”的尊重和理解的。因此,实际上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和用后现代主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原生地大为不同的现实基础和内在理路,是一种抽象的继承。后现代本身的理论逻辑在于,处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潮流之中,它密切关注人的生存,但却一反启蒙以来的常态,试图改变后者尽管推崇“人”、却把人的存在抽象化的做法,力主恢复人的某种本真性,认为抽象的、片面的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原则实际上会反过来,成为对人的这种本真性的遮蔽和压迫。而在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乐观主义共识的阶段,重点选取了后现代主义反理性主义的一面,与启蒙主义一道被援引作为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思想资源,并未细分其中对主体看法的具体分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反对抽象

的、绝对化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更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内容去填充这一基础或本质,但终究,马克思也得谈论基础和本质,即我们熟知的“经济基础”和“人的本质”,只是不是诉诸某种抽象的理念或实体,而是把它们归结为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谈论不是绝对化的、机械的、僵死的决定论,而是具有辩证的视角,认识到总体和相互作用的应有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哲学,因而同时也超越了某些西方现当代哲学简单否定近代思维的层次。

(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失去了资本批判的关键视角

后现代主义要求否定现代性的实践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否定其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反物质生产的方面,在中国激起越来越多的呼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式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对其中的剥削和压迫的揭露,似乎也与后现代主义有了共同语言。但在直接的外观上,现代性弊病的根源地似乎就是工业生产本身,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工业生产。至于近几十年以来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更是显得似乎是生产性、生产逻辑造成其恶果并走到其极限,而资本性、资本逻辑倒似乎是置身事外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并不简单是时间上后于现代性,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否定,从而它在逻辑上也可以包含了对前现代的崇拜。这样的思想和意念,广泛地渗透和表现于社会大众心理的片段、神话和宗教式的神秘主义文化、文学和艺术等的浪漫主义想象、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之中。马克思对“物化”的提法,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出发的重要发挥,在此阶段也充当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此构成了马克思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这实际是透过后现代主义的眼镜所折射出来的马克思。

(三)后现代主义对待社会的碎片化态度

如果说启蒙主义式的理解带有极大的笼统化特征,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这可以追溯到它自产生的初期,就是处在西方近现代历史场景的急剧变化中,是处在西方的没落感、自身的渺小感和对人类未来的茫然无措状态下的,其最初一种表现是仿佛末世的悲观主义。因为前述两种理论立场的限制,后现代主义也就堵住了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寻找答案的线索,甚至也不能如康德式对主体的认知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功能加以逻辑的考察,而只能以更加抽象的方式对“存在”或“生存”加以冥想,将存在或生存本身的困境归结于它本身,最后往往是要从艺术、美学、宗教之类非理论理性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领域寻求解脱,寻求人的价值和归属。还有一些后现代论者是将后现代作为革命的哲

学,乃至确实深入到了实际的社会行动层面,但他们缺乏对革命的对象、主体、动力、机制的科学分析。有的派别在对“现代性”的认识上不同程度地区分出了资本主义,明确了需要变革的对象何为,但对另外几项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模糊的,所以最终也只能或者停留于某种改良主义;或者虽然坚持不懈地进行过程中激进和浩大的行为,但在手段上只能以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抗衡资本主义的武器,从而失去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远景目标,再度与前现代主义式的单纯否定合流;或者只能诉诸群众的非理性热情或乌托邦式的理念设定,成为革命的唯心主义。

三、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三次飞跃及其本质

在中国学界始终存在着与前两种解释路向同时存在,并致力于吸收前两种解释路向的成果,又不断与它们相抗衡的第三种解释路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并没有因为坚持“马”的名义而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在“解马”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只有当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完整提出其两大发现,马克思及其理论才显露出完整意义。我们要根据这一“原本”来理解马克思,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创新成果。

(一)第一次飞跃:超越启蒙理性,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早年深受启蒙主义影响。启蒙主义的特点,就在于离开人们的经济地位抽象地谈论人,谈论抽象的人。无论是18世纪的启蒙学者,还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谈论的都不是人本身,而是理性的人或人的抽象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矛盾并不只是存在于理性中,并不是理性把人的感性仅仅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恰恰相反,理性中的矛盾仅仅是感性世界的自我矛盾的产物和反映。这就使马克思开始真正越出了传统启蒙哲学的范围,达到了一种带有极大人本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为未来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应当说,马克思经过第一次飞跃所达成的带有极大人本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与不久之后的唯物史观相比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物质利益”的难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仍然带有启蒙唯心史观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成果毕竟是走向彻底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前奏。

(二)第二次飞跃:达成实践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开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但到稍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马克思思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转而对这两派旧唯物主义进

行批判,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飞跃。自此之后,马克思彻底超越了近代启蒙的“哲学”传统:他的世界观越出了传统意义的“哲学”范畴,要求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进行考察。唯物史观的提出,彻底终结了关于人性、理性、自由等的抽象人本主义设定,揭示了它们真正得以生发出的实践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在强调“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直接从人和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出发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原理的基础上,第一次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对于全部生活生产的制约作用。后来,马克思明确地把它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认为他们看待“社会关系”至多是从现存的社会关系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实践的角度即从现存社会关系必然被改变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产关系中谈论人,并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看作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把经济的解放看作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这一经济解放的物质前提。

(三)第三次飞跃: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完成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又退回书斋,除了对革命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以及为生计考虑的报刊政论写作,他主要是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工作。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40年代末初步取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建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这是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这次飞跃确证和充实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使之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

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的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辩证地揭示现代文明的基本成果和限度所在,它因此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式的虚无主义解构。马克思这三次飞跃的进程,同时包含着超越启蒙主义传统的线索。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三次飞跃,特别是经历第二、三次飞跃的时候,实际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已经在西方世界开始出现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这三次飞跃,特别是第二、三次飞跃既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又开启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

■ 《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约23000字